

意识的宣言



作者：张皓翔

ORCID: 0009-0001-2997-7726

(书稿阅读下载链接: <https://doi.org/10.5281/zenodo.20185691>(始终指向最新版本))



意识的宣言

——《要素的枷锁》一书的续作

作者简介：

姓名：张皓翔

单位：河南省南阳市第五完全学校高中部

邮箱：nyzhanghaoxiang@outlook.com

ORCID: 0009-0001-2997-7726

书稿 doi: 10.5281/zenodo.20185691

《意识的宣言》第三版

(2026年5月29号)

这本书从第一版定稿至今不过半个月。在这期间，我对书中提出的问题做了持续的推演和反思，发现了一些根本性的缺陷。

首先，核心概念的界定存在严重问题。书中虽然试图区分“作为劳动力的意识”与“意识劳动”，但这两个概念在实际使用中始终是混淆的。什么是“意识劳动”？它和“智力劳动”是什么关系？书中没有给出清晰的界定，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将“智力劳动”当作“意识劳动”的属概念来处理。这种概念上的混乱，导致“作为劳动力的意识”与“意识劳动”之间的关系始终含混不清，两种不同性质的劳动力在论述中常常被混为一谈。

更根本的问题在于，本书所使用的“劳动力”概念与马克思的经典定义之间存在错位。马克思将劳动力界定为“体力与智力的总和”，而本书在没有做出明确说明的情况下，将“作为劳动力的意识”也纳入了“劳动力”的范畴。这种概念上的游离，使得论证过程中出现了许多混乱与模糊。

其次，书中关于“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的讨论，只提出了一个方向性的判断——即上层建筑是劳动力潜能的凝结——但未能完成物质性的传导机制分析。这一问题涉及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命题，我目前尚不能给出令人满意的处理，暂且悬置，留待后续研究。

这些问题是在后续的推演中逐渐显露出来的。理论工作就是这样：提出问题往往比解决问题容易，而真正的困难在于把概念磨锋利、把逻辑推到底。这本书做到了前者，但尚未完成后者。

那项完成的工作，在另一本书里。

关于“作为劳动力的意识”的重新界定——“意识劳动”被重新定义为马克思意义上的体力与智力总和在脑力领域的运用，“作为劳动力的意识”被界定为从中分化出来的一种性质完全不同的特殊劳动力——以及在此基础上对资本界限和共产主义运行逻辑的系统推演，请参阅我的新著《从无物之阵到有物之政：作为劳动力的意识与资本的终结》

【<https://doi.org/10.5281/zenodo.20417028>】(2026年)。

本书作为思想演进的早期记录，仍有其文献价值。但它不是这些问题的成熟表述。

张皓翔

2026年5月29日

第二版前言

(2026年5月23日)

5月15日，第一版定稿。在此之前的五次版本更迭，均止于细枝末节的补充——换一处例证、调一段语序、加一条注释。对于核心理论，从未进行过真正的自我批判与自我反思。第一版的核心逻辑，是用“剥削”与“殖民”的二分法，来统摄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中那些横跨与弥散的支配现象。意识本身不可剥削，但可以被殖民；意识所创造的价值可以被剥削。

这一划分在直觉上给出了清晰的边界，似乎一刀切下去，两个世界就此分明。

然而，在后续的反复推敲中，这套理论暴露出根本性的缺陷。劳动力理论内部出现了“不可触碰”与“可被殖民”的悖论；上层建筑的反作用机制停留在隐喻层面，传导链条缺失；剥削与殖民的概念被泛化使用，失去了精确切割现实的能力；价值理论与非商品化的意识之间发生了错位。这些不是细枝末节，而是地基上的裂缝。

裂缝的暴露，不是理论的失败，而是理论的诚实。它迫使我在第一版的基础上进行彻底的自我否定，然后重来。

第二版的重建，经历了充分的讨论、辩论、批判与推翻。这个过程不是一个人的闭门造车，而是在与批评者的反复缠斗中，一点一点把裂缝补上，把模糊的关节磨锋利。

重建的结果，是四条相互关联的理论推进：严格区分“作为劳动力的意识”与“意识劳动”，废止对前者使用“殖民”概念，重构上层建筑的物质性传导机制，重新划定剥削与支配的边界。第一版的核心判断——意识的双重身份、潜能的仓库、意识不可剥削——没有丢失。它们只是从概念的含糊与逻辑的断裂中被打捞出来，安放在一个更牢靠的地基上。

但理论的修改不是目的。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

这套理论经过再论证之后，最终指向的，不是书架上的另一本学术著作，而是实践。它要回答的问题是：在数字资本主义将一切可流程化的劳动都交给机器的今天，劳动者还能夺回什么？从哪里夺回？怎么夺回？

答案不在抽象的纲领里，而在每一个具体的行动中。夺回教育内容的选择权，夺回劳动节奏的决定权，夺回闲暇时间的支配权，夺回自身数据的控制权——这些不是在理论推演中产生的命题，而是在实践的土壤里长出来的要求。理论能做的，是把它们从分散的、孤立的、被体验为个人失败的处境中打捞出来，重新表述为结构性的、可斗争的、有方向的集体任务。

5月15日的定稿，不是终点。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这第二版，同样不是终点。

它只是经过了第一轮批判与重建。但理论从来不是一劳永逸的教条。它要在未来的实践中不断接受检验，不断被修正，甚至在必要时再次被推翻、再次被重建。这不是理论的不自信，而是理论的自觉——凡是有生命力的理论，都有勇气直面自己的裂缝，并有力量在裂缝上长出新的东西。

张皓翔

2026年5月23日

第一版前言

(2026年5月15日)

意识，作为人脑所特有的产物，在百余年来研究与考察中，始终被当作一种虚无缥缈的东西来讨论意识世界，要么作为一种模糊的观念被哲学家们反复掂量，要么作为一种笼统的上层建筑被社会与政治经济学家们归类归档。它始终披着一层神秘化的、飘忽不定的面纱，悬浮在物质世界的上空，仿佛一个来自异域幽灵，可以被谈论，却很难被真正抓住。

但随着生产力与生产工具的更新，这层面纱正在被撕开。不是因为理论家们突然变得聪明了，而是因为——套用一句并不恰当却足够形象的表述——简单的、陈旧的概念与生产工具，已经无法再挡住意识登场的脚步了。意识的真实身份，正在从观念的迷雾中走出来。

人们有意识的思考，从来就不是什么神秘的事情。真正神秘的，是为什么我们花了这么久才敢于承认：意识不只是上层建筑，它同时也是生产力；不只是被决定的东西，同时也是在起作用的东西；不只是观念的力量，同时也是经济的力量。

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础性问题——上层建筑如何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在这一认识下获得了全新的解答。当意识被确认为一种劳动力，而且是一种最高级、最特殊的劳动力时，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就不再需要诉诸任何“观念的神秘力量”。它是被固定下来的劳动力潜能新的条件下的重新释放。唯心主义的后门，被彻底封死了。

当意识作为一种主要的劳动力形态登上政治经济学的舞台时，政治经济学本身就必须变成一门与“意识”息息相关的政治经济学。而追问意识是什么、它在生产中扮演什么角色、它如何被支配、它又如何被解放——这本身就是一个哲学的行为。

本书在系列著作中承担两个任务。

第一，它要明确与《要素的枷锁》的关系。《要素的枷锁》在讨论数字资本主义的生活领域剥削与共产主义运行逻辑时，对意识未能充分展开。本书正是针对这一缺口进行的补充——聚焦于意识这一特定的劳动力形态，深入分析它在当代数字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双重身份及其支配逻辑，从而完善整个理论体系。

第二，它要解决《要素的枷锁》与《双重视阈》之间的那个潜在的理论断点。《双重视阈》揭示了用户在平台上被无偿剥削的现象，《要素的枷锁》则断言意识本身不可剥削。本书通过严格区分“意识本身”与“意识所创造的价值”，弥合了这两者之间的裂缝，从而完成了整个理论体系的逻辑闭环。剥削与殖民，从此不再是混为一谈的概念，而是两种不同但相互缠绕的支配逻辑。

同时，本书必须明确自己的唯物主义立场。

意识不是独立于物质的实体，不是从天而降的精神。它是人脑这一物质器官的机能。它所产生的观念、知识、判断，一旦被生产出来，可以存储于语言、文字、制度、技术等物质载体之中，并在新的物质条件下被激活，引发物质性的连锁反应。这就是“观念力量”的物质基础。本书的所有讨论，都建立在这个前提之上。我们不谈论“物质与意识谁是第一性”的哲学基本问题——那是一个已经解决的问题。我们只在这个问题的答案（物质是第一性的）已经明确的前提下，讨论意识在人类社会历史中具体扮演了什么角色、如何被支配、又如何能够被解放。

因此，本书既是一次理论的推进，也是一次立场的宣示。它要说的，不是一个关于“意识”的抽象理论，而是一个关于我们每一个人如何被支配、又如何可能不再被支配的具体分析。

这就是《意识的宣言》——不是意识自己在宣言，而是我们关于意识的宣言。

张皓翔

2026年5月15日

目录

第一章 意识的双重身份：从上层建筑到经济力量	6
第一节 意识的双重身份：从上层建筑到经济力量	7
第二节 潜能的凝结与释放：上层建筑作为意识的“仓库”	10
第三节 以意识为核心：上层建筑作为历史性凝结	12
第二章 反作用的经济本质：上层建筑如何成为经济力量	14
第一节 “决定”的真实含义：规定什么能被释放，什么必须被雪藏	14
第二节 凝结的过程：被雪藏的潜能如何变成上层建筑	15
第三节 释放的条件：技术和生产如何打开仓库的大门	16
第四节 反作用的本质：被释放的经济力量，而非观念的力量	17
第三章 作为劳动力的意识：不可支配的边界	20
第一节 两种劳动力：意识劳动与作为劳动力的意识	20
第二节 作为劳动力的意识：为什么不可被资本支配	21
第三节 资本无法掌控的力量：与非物质劳动理论的对话	22
附录	26
引用	26
问答	26

第一章 意识的双重身份：从上层建筑到经济力量

在过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中，意识始终被放置在上层建筑的领域中被讨论、被观察、被研究。这一定位本身没有错——社会意识由社会存在所决定，并反作用于社会存在，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命题（马克思，2009：591）。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个命题在漫长的理论史中被逐渐窄化，意识被理解为“观念的东西”，其反作用被理解为“观念的力量”。仿佛意识是从物质世界之外飘来的某种精神性存在，它在经济基础的“最终决定”下活动，却始终与那个物质性的根基保持着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

这种理解并非没有道理，但它遗漏了一个更为根本的事实。

随着社会存在与生产技术条件的发展，随着物质条件的日益丰富，新的生产工具——人工智能、脑机接口、神经技术——开始大规模地进入人类的生产过程。这些工具的出现，迫使我们重新审视“意识”在人类生产活动中所扮演的角色。我们终于进入了一个更为深层的认知领域：意识这一人所特有的产物，不再仅仅是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存在，它更是一个人最高级、最独特的劳动力。【在展开本书的正式论述之前，有必要先与马克思对“劳动力”的经典定义做一个对话。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将劳动力界定为“人的身体即活的人体中存在的、每当人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就运用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马克思，2004：195）。这个定义在其所处的历史条件下是精确且充分的。然而，在数字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今天，“智力”内部一条根本性分野的裂缝终于显现出来，可以被我们察觉：一部分智力可以被流程化、标准化、被算法替代（本书称之为“意识劳动”）；另一部分智力因其不可复制性、不可衡量性而永远拒绝被资本捕获（本书称之为“作为劳动力的意识”）。这不是对马克思的否定，而是对马克思方法的延续——正如马克思在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区分了“劳动”与“劳动力”，我们也在马克思的基础上，对“智力”做出进一步的区分。这一区分是全书全部论证的基石。】

但这里需要立即做一个澄清，以免落入概念混淆的陷阱。这绝不意味着简单地宣称“意识既是上层建筑又是经济基础”——这种说法既粗陋又含混。正确的表述是：意识在不同的维度、以不同的身份、在不同的关系中被对待。当意识以特定的形态出现时，它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当意识以另一种形态出现时，它属于经济基础的范畴。两者不是同一个东西，而是同一个人能力在不同层面的展开。

更重要的是，当我们说“意识是一种劳动力”时，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里存在着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意识劳动力”。它们的混淆，是此前一切理论混乱的根源。本书将严格区分这两个概念，并将其作为全部分析的逻辑起点。

第一种，也是本书的核心概念，叫作“作为劳动力的意识”。是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劳动力自身一道根本性裂缝的时代化显形——从传统的体力与智力总和的劳动力中被人们意识到可以分离出来的一种劳动力——也是理解数字资本主义的一个关键区分，是一种极为特殊的劳动力，也是作为高级的劳动力，是传统经典理论无法涵盖或者说解释不足的地方。它指的是人脑所固有的、能够在具体情境中做出特异性判断、进行不可复制的决策、赋予独有意义、设定独到方向的那种能力。它不是按部就班的智力运算，不是在外部的规划下执行的脑力任务，而是那种带有鲜明主体性印记的能力：它在每一个具体的历史处境中都是独一无二的，无法被分解为可重复的操作步骤，无法被外部程序所替代，拒绝被纳入任何统一的度量衡。它的每一次调用都带有不可还原的独特性——换一个人、换一个时间、换一个条件，同样的“输入”不会产生同样的“输出”。这是人的本质力量中最核心、最不可还原的部分。

第二种，叫作“意识劳动”。本质上仍属于马克思所定义的劳动力——体力和智力的总和一的具体使用过程。它指的是按外部规划、有既定流程、可分解为步骤的脑力支出。编写

代码、绘制标准图纸、撰写格式报告、按照算法要求进行数据标注——这些都是意识劳动。它的核心是“智力”，是“解决问题的能力”，是“按照要求产出成果的能力”。意识劳动可以被分解为标准化环节，可以被不同的人以相同的方式执行，其产物可以被衡量（代码行数、图纸张数、报告页数），可以被占有，可以被剥削。

这两个概念不是同一个东西的“潜能”与“使用”。它们是两种不同性质的劳动力。一个人可以在进行意识劳动时完全不调用“作为劳动力的意识”——比如机械地按照手册填写表格；也可以在调用“作为劳动力的意识”时完全不进行意识劳动——比如做出一个战略决策，这个决策本身不是按流程产出的“成果”，而是方向性的、不可复制的抉择。两者可以同时发生，也可以各自独立发生，但绝不能混为一谈。

这一区分是全书全部论证的基石。简言之：作为劳动力的意识——特异性判断、不可复制的决策、方向性的意义赋予——不可剥削、不可占有、不可衡量，不可被资本有效支配。意识劳动——智力、规划、按任务产出——其过程及其产物可以被剥削。后续所有讨论，都建立在这个区分之上。

第一节 意识的双重身份：从上层建筑到经济力量

当意识表现为体系化的社会观念形态时——一个时代的价值取向、审美标准、道德规范、认知范式——它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社会意识由社会存在所决定，并反作用于社会存在。一定社会的观念体系，是该社会生产方式、阶级结构、权力关系在思想层面的投射与结晶。它不是为了自身而存在的纯粹精神，而是被特定历史条件下人们的物质生活过程所塑造、所限定、所驱动的。

在这个意义上，意识作为上层建筑具有三个基本特征。第一，它被社会存在所决定。人们并不是自由地选择自己的观念。奴隶社会不可能产生“天赋人权”的意识形态，封建社会不可能自发生长出“自由平等博爱”的价值观。一个时代的意识，归根到底是那个时代的物质生活条件的产物。这不是机械的决定，不是线性的推导，而是说：任何观念的兴起、传播、制度化，都以一定的物质前提为基础，并受到那个时代生产力水平和生产关系的制约。第二，它具有相对独立性。一旦某种观念体系被生产出来，它就不会随着经济基础的即时变化而瞬间消失。封建观念在资本主义初期仍然顽强地存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仍然以各种形式渗透。这种惯性不是因为观念本身有“魔力”，而是因为观念被固定在了语言、文字、法律、制度、风俗习惯等物质载体之中，这些载体有自身的稳定性和延续性。第三，它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观念不是被动地躺在那里被经济基础决定的影子。它塑造人的行为，组织人的劳动，规定人对生产关系的认同或反抗。一种成功的意识形态，能够有效地将统治阶级的利益转化为全社会接受的“常识”，从而降低统治成本、维持生产关系的稳定。这种反作用是真实存在的，是历史唯物主义必须解释的现象。

然而，传统理论在解释这种“反作用”时，往往止步于描述其现象——说它“起作用”，却没有揭示其起作用的物质机制。这就给唯心主义的幽灵留下了后门：仿佛观念真的有一种独立于物质的精神力量，能够反过来推动物质世界。这不是马克思的本意，但却是传统表述中最容易被误解、最容易被利用的模糊地带。

现在，让我们从另一个维度审视意识。当意识不是作为社会化的观念体系，而是作为个体在劳动过程中所动用的能力时，它属于生产力的范畴。但这里必须立即区分两种不同的能力。

第一种，即本书反复强调的“作为劳动力的意识”。它是那种在具体情境中做出特异性判断、在模糊条件中确立方向、在不可复制的历史处境中做出决策的能力。它不是按流程运转的智力，而是那个带有主体性印记的“决断”。当一个指挥员在复杂战局中制定出无法被

教科书复制的战略——这个战略本身，就是“作为劳动力的意识”在起作用。当一个工程师面对多个技术方案，选出一个在当下条件下最不可替代的路径——这个选择本身，就是“作为劳动力的意识”在起作用。这种能力无法被分解为步骤，无法被时间度量，无法被外部程序所替代。它的每一次调用都是独一无二的，拒绝被任何统一的度量衡所捕获。

第二种，是“意识劳动”。它是指按照既定规则、流程、任务要求，运用智力产出成果的过程。编写一段标准代码、按照模板绘制图纸、根据算法要求进行数据分类——这些都是意识劳动。它需要智力，但不需要那种不可复制的“决断”；它可以被外部安排，可以被量化考核，其产物可以被占有，其过程本身也可以被资本支配。

在漫长的历史中，生产力主要依赖的是“意识劳动”——体力劳动者的简单脑力配合、工匠的技艺传承、工程师的标准化设计。而“作为劳动力的意识”长期被压抑、被闲置、被排斥在主流生产过程之外，因为它拒绝被纳入资本的计算体系。但数字资本主义的到来改变了这一切——当人工智能开始代劳程序化的意识劳动，生产过程中唯一剩下的、只有人才能提供的那个变量，恰恰是“作为劳动力的意识”：那种在关键节点上做出不可复制的判断、设定方向、赋予意义的力量。

因此，本书接下来的论述将严格遵循这一区分：

- 当我们说“意识不可剥削”时，指的是“作为劳动力的意识”——特异性判断、不可复制的决策、方向性意义赋予的那个能力本身。
- 当我们说“平台上用户的浏览数据被剥削”时，指的是“意识劳动”及其产物——那些按算法引导产生的点击、停留、互动记录；同时也包括意识劳动过程本身被资本支配的事实。

两者遵循完全不同的支配逻辑。混淆它们，就是混淆整个理论大厦的地基。

什么是劳动力？劳动力是人的身体中蕴藏的、能够在劳动中支出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马克思，2004：195）。当然，正如前文所说在数字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今天，“智力”内部一条根本性分野的裂缝终于显现出来，可以被我们察觉：一部分智力可以被流程化、标准化、被算法替代（即“意识劳动”）；另一部分智力因其不可复制性、不可衡量性而永远拒绝被资本捕获（即“作为劳动力的意识”）。然而，在漫长的历史中，劳动力主要表现为体力支出与简单智力的应用——肌肉的力量、手脚的灵巧、感官的敏锐、机械的思考。即使到了工业时代，劳动者的主要价值仍然是作为“操作者”存在：操作机器，执行流程，完成被分解为标准化动作的任务。其中脑力劳动(哪怕是混成一体的脑力劳动)虽然一直被承认，但其权重远不及体力劳动——因为生产力水平还没有发展到让“思考”成为生产过程中最稀缺、最关键的那个变量。

但情况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当人工智能开始代劳具体的执行——编写代码、绘制图纸、操作设备、甚至诊断疾病——当具体操作的边际成本趋近于零，生产过程中唯一剩下的、只有人才能提供的那个变量，就是作为劳动力的意识。更准确地说，是其中包含的不可复制的判断、决策、审美、赋予意义、设定方向的能力。这不是说人类从此不再需要体力或技能，而是说：在生产力的高阶形态中，作为劳动力的意识的调用成为整个生产过程的“第一推动力”。工具可以执行，但工具不能自主做出那个不可复制的判断；算法可以优化，但算法不能自主设定优化的终极方向；机器可以生产，但机器不能自主理解生产出来的产品对人的意义是什么。这些，只有作为劳动力的意识能做到。

因此，我们必须承认一个曾经被长期压抑的事实：作为劳动力的意识本身就是一种劳动力，而且是迄今为止人类所拥有的最高级的劳动力。它不像体力那样可以被简单地量化，不像重复性技能那样可以被标准化，不像操作流程那样可以被完全程序化。它的价值恰恰在于它的独特性、不可替代性和创造性。

这里需要引入一个或许看似朴素的命题：意识是人改造世界走向文明所使用的第一批

“工具”。请允许我给“工具”这个词加上引号。之所以加引号，是因为意识本身不是外在于人的工具——它内在于人，是人的本质能力的一部分。但就其功能而言，它在人类改造世界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与工具是高度同构的：它是“被用来”认识世界、判断情境、规划行动、创造新事物的那个中介。在人类学会制造石器之前，意识就已经在指导着最原始的采集和狩猎——判断哪些果子能吃，规划明天去哪里捕鱼，决定如何分工协作。没有意识这个内在的“工具”，外在的工具（石斧、弓箭、机器、算法）就永远不会被发明出来，更不会被有效地使用。

作为劳动力的意识具有三个根本特征。第一，它是最高级的劳动力。在所有的劳动力形态中，作为劳动力的意识处于金字塔的顶端。体力可以被机器替代，重复性技能可以被算法替代，甚至某些创造性工作（如生成标准化的图像、音乐、文本）正在被人工智能部分替代。但那种在复杂情境中做出不可复制的价值判断、在不确定中设定方向、在既有框架之外产生新想法的能力——是目前任何机器都无法替代的。这不是因为技术不够发达，而是因为这种能力本质上与人的生命体验、情感、价值立场、历史处境不可分离，它的每一次调用都是独一无二的。第二，它是最特殊的劳动力。体力劳动可以被量化：你搬了多少块砖，走了多少公里，消耗了多少卡路里。重复性技能可以被标准化：你焊了多少个焊点，合格的比率是多少。但作为劳动力的意识的调用无法被这样衡量。一个关键的判断可能只需要几分钟，但它可能决定一个项目的成败；一个天才的创意可能只在一瞬间闪现，但它可能开启一个全新的产业。作为劳动力的意识的投入与产出之间，不存在线性关系。它是最特殊的劳动力，因为它拒绝被纳入任何统一的度量衡。第三，它是最不可替代的劳动力。在数字资本主义的剥削图景中，资本因无法给他一个正当的位置与恰当的处境，因此通常对他执行最高级的打压——无视——通过否定具有主体性的想法，通过批判超出常规的思考，通过奖励和赞扬循规蹈矩的行为，试图为劳动者植了一个标准——一切主体性的，不可复制，不可拆解，具有高度个人化、特异性的都是不被社会认可的，试图以此来用可以被剥削，可以被掌控，可以被支配的意识劳动替代这一作为劳动力的意识，然而，这种打压与置换本身，恰恰从反面印证了作为劳动力的意识的不可替代性——如果它真的可以被替代，资本何必如此费尽心思地否定它、压制它、用虚假的标准围剿它？正是因为这种能力拒绝被任何机器、算法或流程所复制，资本才不得不退而求其次：它无法消灭这种能力本身，只能通过塑造一种“主体性是危险的”的社会氛围，让劳动者自己放弃调用它。不可替代性，在这里表现为一种被资本围剿却始终无法根除的倔强——它越是不可替代，资本就越要假装它不存在；资本越假装它不存在，就越暴露它的真实力量。

请注意：上述三个特征——最高级、最特殊、最不可替代——全部指向“作为劳动力的意识”，而非“意识劳动”。意识劳动虽然也属于脑力支出，但它遵循不同的逻辑：其过程可被外部规划、可被时间度量，其产物可被衡量、被占有、被剥削。关于意识劳动被支配的具体机制，将在第三章详细展开。

现在，我们必须面对一个显而易见的追问：意识怎么能同时是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这两者不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框架中属于两个不同的层次吗？答案是：同一个事物可以在不同的关系中被定位。这不违背逻辑。水在一个语境中是溶剂，在另一个语境中是反应物，这并不矛盾。同样，意识在不同的维度上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当意识以社会化的、制度化的、历史地凝结成的观念体系出现时——比如一个时代的“主流价值观”“科学范式”“审美标准”——它属于上层建筑。因为它是由那个时代的社会存在所决定的，它反映着那个时代的生产关系和阶级结构，它作为一套规范性的框架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当意识以个体在劳动过程中实际调用的认知、判断、决策能力出现时——比如一个工程师在设计图纸时在脑海中构建的三维模型，一个医生在诊断时对病情的综合判断，一个艺术家在创作时对形式和意义的瞬间把握——它属于生产力。因为它是直接参与价值创造的，它是活劳动的一部分，它是人在改

造世界时所动用的核心能力。

需要指出的是，这里“属于生产力”的讨论，主要指向“作为劳动力的意识”——那种内在于人的、能够进行不可复制的判断和决策的能力本身。至于“意识劳动”，它是这种能力在特定条件下被外部规划后的外化使用，其产物和过程则属于政治经济学传统分析的范畴，将在第三章讨论其被剥削的机制。

这两个维度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相互渗透、相互转化的。一方面，个体的意识能力（作为劳动力）总是在一定的社会观念体系（作为上层建筑）中被塑造和训练的。一个人如何思考、如何判断、如何决策，从来不是纯粹的“个人天赋”，而是被他所处的文化传统、教育制度、知识范式所深刻影响。在这个意义上，上层建筑“内化”为劳动力的一部分。另一方面，社会化的观念体系（作为上层建筑）之所以能够存在和延续，恰恰是因为无数个体在日常劳动中实际调用着这些观念来进行判断和决策。一个科学范式之所以成为“范式”，不是因为它在天上有独立的实体，而是因为一代又一代的科学家在具体的研究工作中用这套范式来指导自己的思考和实验。在这个意义上，劳动力“外化”为上层建筑。

因此，意识的双重身份不是理论的矛盾，而是理论对现实的更精确把握。它不是要取消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区别，而是要在承认这个区别的前提下，揭示二者之间那个被长期忽视的“中介”——意识本身。意识既是那个被决定的（作为上层建筑），又是那个在起作用的（作为劳动力）。它不是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第三者”，而是贯穿两者的那个活生生的、不断运动着的人类能力本身。当我们说“意识作为上层建筑”时，我们强调的是它的社会化、历史性、被决定的一面。当我们说“意识作为劳动力”时，我们强调的是它的个体性、实践性、创造性，与经济性的一面。两者合在一起，才构成对意识的完整理解。

第二节 潜能的凝结与释放：上层建筑作为意识的“仓库”

在《要素的枷锁》中，我们已经论证过一个贯穿全书的基本命题：人的劳动力的价值是巨大的(张皓翔, 2026a)。这不是一句空洞的赞美，而是一个需要被认真对待的经济事实。劳动力是人类改造自然、创造财富的唯一能动源泉，离开了它，一切生产资料都只是沉睡的物。

然而，如此巨大的劳动力，在他所处的每一个历史时代中，却面临着一种深刻的二重性。一方面，正是因为劳动力被要素化——从混沌的生命活动中被分离、被识别、被衡量、被安排——它才第一次获得了被系统性地组织、调配和释放的可能。没有要素化，劳动力就永远沉睡在血缘共同体和自然经济的迷雾之中，无法汇聚成建造城邦、开凿运河、运转工厂、编织数字网络的社会性力量。要素化是释放的条件。另一方面，也正是要素化本身，给劳动力戴上了枷锁。当劳动力被当作一种可分离、可衡量、可安排、可占有的要素来对待时，它就被从人的完整生命中剥离出来，成为外在于人的、服务于他人目的的工具。劳动者越是“高效”地释放劳动力，他就越是深刻地丧失对自身劳动力的自主支配权。要素化是释放的条件，同时也是压迫的根源。

在这两种力量的拉扯中，劳动力的大部分潜能被雪藏了。它没有被消灭——因为劳动力内在于人的生命，只要人还在，潜能就在——但它被压抑、被闲置、被排斥在现实的生产过程之外。这种雪藏不是偶然的失误，而是要素化逻辑的内在代价。

在一切劳动力形态中，意识这种独特的劳动力的潜能往往是最大的。道理并不复杂：体力有上限，重复性技能可以被机器超越，但意识——判断、决策、审美、赋予意义、设定方向的能力——它的可能性边界至今无人能够划定。一个人可以在几分钟内做出改变一生的决策，一个念头可以催生一个产业，一种审美可以重塑一个时代。意识的潜能，几乎是人类所知的唯一一种“越使用越增长”的资源。然而，也正因为它的潜能最大，它往往也是最容易被

时代与所处的社会条件所限制的。在生产力低下的阶段，人们的大部分精力被用于满足基本生存需求，意识被绑定在具体的、重复性的生存劳动上，没有余裕去展开它的高级形态。在分工和阶级社会中，绝大多数人的意识被限定在狭窄的专业领域内，被训练为服务于特定生产环节的“工具性脑力”，其广阔的判断力和创造力被系统性地闲置。到了数字资本主义时代，资本更是通过算法、平台、成瘾设计，对意识劳动进行前所未有的引导与支配——不是剥夺它，而是让它“自愿地”流向资本预设的方向，从而将其压缩在资本增殖所需要的狭窄轨道之内。

但这里必须做出一个重要的理论判断：这种巨大的潜能并不会消失。它不会因为被压抑、被闲置就从世界上蒸发。它会以特殊的形式被保留和固定下来，静静地存储在历史的仓库中，等待社会生产力发展到能够满足其释放条件的那一天，再重新被激活、被释放、被转化为现实的力量。

在《要素的枷锁》中，我们已经论述过一种保留形式：数据、信息等是对普通劳动力的保留。每一次劳动操作、每一次生产记录、每一次技术操作，都会留下痕迹(张皓翔, 2026a)。这些痕迹以数据或信息的形式被固定下来，成为后世可以调用、分析、激活的历史劳动潜能。这部分保留包含了普通劳动力的经验、技巧、操作模式，也包括了意识这一特殊劳动力的部分潜能——比如一个工匠在操作中凝结的判断智慧，一个工程师在设计图中留下的思维轨迹。

但是，意识这一特殊劳动力的绝大部分潜能，并不是以数据或信息的形式被保留下来的。数据只能记录意识的外化结果——你做了什么决定、画了什么图、写了什么代码——但无法记录那个“做出决定”的意识活动本身。意识在每一次调用中的独特质感、它背后的价值权衡、它在大脑中的瞬间涌现，这些才是意识潜能中最核心、最不可还原的部分。

那么，这些最核心的潜能去了哪里？答案是：它们以“作为上层建筑的意识”的形式被保留下来。这正是本书试图揭示的核心机制之一。一个时代的价值观念、审美标准、道德规范、认知范式——这些看似“飘在云端”的上层建筑，实质上是该时代人的意识潜能的结晶。当一代又一代的劳动者在劳动中调用他们的判断、决策、创造能力时，这些意识活动不会随着劳动的结束而彻底消失。它们会被沉淀为语言、被固化为制度、被编码为风俗、被凝聚为艺术作品、被传承为知识体系。这些东西不是“精神的”，而是被存储在各种物质载体（文字、建筑、仪式、技术）中的、可被后世激活的意识潜能。

需要进一步明确的是：上层建筑并非铁板一块。它包含着两个既有区别又相互缠绕的维度——政治上层建筑与思想（观念）上层建筑。政治上层建筑（法律制度、国家机器、政权组织形式）是以全体劳动力为核心的经济基础的历史性凝结，它直接承载着生产关系的固化形式；思想上层建筑（道德、文化、价值观、理论体系）则是以意识劳动力为核心的经济基础的历史性凝结。本节所讨论的“作为上层建筑的意识”，主要指涉后者。但无论哪一个维度，上层建筑所储存的都不是已经固化的价值，而是中性的劳动潜力、社会运行潜力、精神发展潜力。这些潜力本身没有阶级属性，没有善恶属性，只是人类历代劳动留存的“社会劳动储备库”。

正因如此，上层建筑作为“仓库”的潜能是中性的。它不会自动发挥作用。没有当下活劳动的参与，一切上层建筑的历史凝结都只是无实际效用的存量储备，不具备任何现实价值。只有通过现实的、活的劳动——无论是统治阶级的立法、行政、教化，还是被剥削阶级的批判、反抗、重构——这些沉睡的潜能才能被激活，转化为现实的力量。潜能的现实作用，从来不取决于潜能本身，而取决于谁在当下用何种立场的活劳动去激活它。简单的说，就是上层建筑作为仓库所储存的潜能是中性的。但上层建筑却具有鲜明的阶级性。我们之所以强调潜能是中性，并非否认上层建筑的阶级性，而是旨在说明：上层建筑中的思想文化、制度形式等文明成果，并非某一阶级的专属物；无产阶级可以立足自身立场、遵循自身利益，对旧上层建筑进行批判、改造与扬弃，剥离其剥削阶级内核，继承、利用其中合理进步的文明内

容，使其转化为服务无产阶级解放、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现实力量。

这就解释了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中一个长期被接受却很少被追问的命题：正确的意识能够能动地指导人们改造世界（马克思、恩格斯，2009：525）。这个命题的正确性毋庸置疑，但它的具体作用机理——意识究竟是如何“能动地指导”物质世界的——在传统表述中往往被笼罩在一层薄薄的神秘主义烟雾之下，仿佛观念天生就有一种推动物质的力量。本书提出的回答是：这种“能动指导”的作用机理，正是上述“凝结-存储-释放”机制的具体运作。当后世的人们接触到前人的观念体系时——读到一本古籍，遵循一套法律，传承一门手艺，接受一种教育——他们实际上是在接触那些被固定下来的、前人的意识潜能。这些潜能不会自动生效，它们需要被活的后世的意识所“激活”：理解、批判、继承、转化。正是在这个激活的过程中，前人的意识潜能转化为后人改造世界的能力。这不是“观念推动物质”，而是历史上被固定下来的意识潜能，在新的物质条件下被重新释放，转化为现实的、物质性的力量。详细的作用机理，将在第二章展开。此处仅做提示。

第三节 以意识为核心：上层建筑作为历史性凝结

至此，一个更为根本的追问浮出水面：如果说上层建筑中凝结着意识的潜能，那么上层建筑与意识之间的关系究竟是什么？它们是一个东西的两种说法，还是两个不同的范畴在某个点上发生了交汇？

答案是：到目前为止的一切上层建筑，都与意识有着脱不开的干系——但“脱不开干系”在这里有两层不同的含义。对于思想上层建筑（道德、文化、价值观、理论体系）而言，它直接以意识劳动力为核心凝结而成，离开意识活动，它根本无法产生；对于政治上层建筑（法律制度、国家机器、政权组织形式）而言，它虽然主要以全体劳动力的历史性凝结为基础，但它的运行、维持和功能发挥——法律的被遵守、权力的被承认、制度的被延续——一刻也离不开活的人的意识的认同、服从、反抗或妥协。无论哪一种含义，结论都是：没有意识，就没有上层建筑。上层建筑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是某个超越性的精神实体投射到人间的影子，而是人的意识活动（以及更广泛的劳动实践）在社会历史中留下的沉淀物。

让我们一步步地展开这个论证。首先，上层建筑的核心内容是什么？法律、政治、宗教、艺术、哲学——这些领域的基本构成单元，无一不是人的意识活动的产物。法律条文是人类判断是非、界定权利的结晶；政治制度是人类协调利益、分配权力的设计；宗教教义是人类对超越性存在的想象与敬畏；艺术作品是人类情感、审美、观念的具象化表达；哲学体系是人类对世界、对自身进行系统思考的成果。离开了人的意识活动——离开了判断、想象、审美、思考——这些东西连一天都无法存在。

其次，上层建筑的运行机制是什么？一套法律体系之所以能够约束人的行为，不是因为法条自己会说话，而是因为人的意识认同它、畏惧它、或者至少在计算违法的代价。一种意识形态之所以能够成为“主流价值观”，不是因为它被刻在了石头上，而是因为无数个体的意识在日常实践中不断地接受、传播、强化它。上层建筑的每一次“起作用”，都离不开活的人的意识的参与——要么是认同，要么是反抗，要么是妥协，但绝不可能是意识的缺席。

因此，我们可以做出一个恰当的整合：以意识为核心来理解上层建筑。这不是说上层建筑就是意识，而是说上层建筑是意识的社会化、客观化、历史化的产物。意识是“活”的、流动的、个体性的；上层建筑是“死”的、固化的、社会性的。但死的、固化的上层建筑，是从活的、流动的意识活动中凝结出来的，并且只有在重新被活意识激活时，才能发挥作用。

从这个视角出发，我们可以对“上层建筑”的本质得出一个新的定义：上层建筑，实际上是旧的经济基础在人类的实践活动中所形成的历史性凝结。

这个定义需要拆解为几个层次来理解。

第一层：“旧的经济基础”。这里所说的“旧”，不是“过时的”或“已灭亡的”，而是一个严格的理论界定：任何已经被固化、被表述、被观测、被制度化的经济基础状态，相对于那个永远在流动、永远无法被完全捕捉的“绝对当下”而言，都是“旧的”。几秒前刚刚形成的经济基础格局，相对于这一秒正在进行的、尚未凝固的实践，就是“旧的”；几十年前的生产关系相对于今天，当然也是“旧的”。固化一旦发生，就立即成为“过去”。

然而，这里必须补充一个关键的中间环节：经济基础的变化，在绝大多数日常情况下是量变，而非质变。生产力在积累，交换在扩大，但短期内通常不足以推翻既有生产关系的框架。因此，几秒前固化的经济基础与几秒后的现实状态高度连续、高度相似。正是这种量变积累阶段的连续性，使得“旧”的固化形态——即上层建筑——能够有效地服务于“当下”的经济基础。它服务的仍然是“已经过去的”那个状态的惯性延伸，而不是“绝对当下”本身；但由于量变阶段的连续性，这两者在效果上高度重合。只有当质变发生时——当生产力积累到足以冲破既有生产关系的框架——这种连续性才会断裂，“旧”的上层建筑才会从“维稳工具”转变为“被冲垮的堤坝”。

基于此，上层建筑扎根于已经存在的、正在运行的经济基础之中——封建社会的法律体系反映的是封建生产关系的要求，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服务于资本增殖的逻辑。但这里的关键词是“旧”：上层建筑一旦形成，它就会超越自己原来的那个经济基础而继续存在。封建法律在资本主义初期仍然被沿用，资产阶级观念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仍然有市场。它带着旧时代的烙印，却活在新时代的土壤里。在量变阶段，这种“旧”形态与当下现实的高度连续性，使它能够充当维稳工具；而在质变阶段，这种连续性断裂，它就成为需要被打破的枷锁。

第二层：“在人类的实践活动中”。上层建筑不是经济基础自动分泌出来的分泌物。它不是像树结果实那样自然发生的。它是通过人的实践活动——劳动、斗争、交往、创造——被生产出来的。每一次立法，每一次起义，每一次宗教改革，每一次艺术创作，都是意识在实践中的外化。无数这样的外化活动积累、碰撞、筛选、沉淀，最终结晶为制度、规范、观念体系。没有实践，就没有凝结；没有凝结，就没有上层建筑。

第三层：“历史性凝结”。凝结是一个物质性的过程，而不是精神性的隐喻。正如水蒸气遇冷凝结为水珠，液态的意识活动在特定的历史条件（物质载体、社会制度、传播媒介）下，被固定为可保存、可传递、可激活的社会形式。这种凝结不是永恒的——它可以被打破、被重铸、被新的实践所瓦解。但它一旦形成，就获得了一种相对独立的存在，成为后续实践的前提和条件。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上层建筑从来不是“自然溢出的结果”，也不是“自带超越性的宝藏”。它是阶级斗争的沉积场。它所储存的中性潜能——无论是以政治上层建筑（法律制度、国家机器）还是思想上层建筑（道德、文化、价值观）的形式存在——都必须通过当下的、有阶级立场的活劳动去激活。谁能够系统性地掌握和运用当下的活劳动，谁就能让这些潜能服务于谁的目的。统治阶级之所以能够把上层建筑变成维稳工具，恰恰是因为他们掌握着立法、行政、警察、意识形态教化等活劳动；而被剥削阶级的未来革命，同样需要通过自己的活劳动，去激活那些被压抑的潜能，将其转化为反抗的武器。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贯穿全书的命题：上层建筑是历史上被固定下来的、以意识为核心的劳动力潜能的存储形式。每一个时代的法律、政治、宗教、艺术、哲学，都是那个时代无数劳动者的意识活动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留下的印记。这些印记中凝结着他们的判断、他们的审美、他们对世界的理解、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些凝结物不会随着那个时代的消失而消失，它们被语言、文字、建筑、仪式、技术所承载，穿越时间的河流，成为后世人类可资调用、可被激活的历史遗产。

而“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这一经典命题，至此获得了全新的解释：这种反作用，不是观念的力量，而是被固定下来的、以意识为核心的劳动力潜能，在新的物质条件下被重

新释放、重新激活、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过程。详细的作用机理，将在第二章展开。

第二章 反作用的经济本质：上层建筑如何成为经济力量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马克思，2009：591；恩格斯，2009：608）。这对命题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传统中几乎被视为公理，每一个学习者都能背诵，每一个研究者都在使用。但“决定”究竟意味着什么？“反作用”究竟以什么样的机制发生？这两个问题被反复提出，却从未得到真正令人满意的回答。

最常见的解释是：经济基础“归根到底”决定上层建筑，但上层建筑具有相对独立性，能够“反作用”于经济基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编写组，2023：140）。这种解释在政治上是安全的，在理论上却是含混的。它用“归根到底”回避了“如何决定”的具体机制，用“相对独立性”回避了“反作用”的物质基础。于是，一个诡异的局面出现了：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仿佛存在着一道不可见的屏障——经济基础在屏障的这一边“最终决定”，上层建筑在屏障的那一边“相对独立”，两者通过某种无法言说的神秘力量相互影响。这道屏障之所以存在，正是因为经典理论始终未能揭示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从上层建筑到经济基础的完整传导链条。

在前文我们已经为破解这个难题铺设了地基。我们论证了意识的双重身份：它既是上层建筑的核心内容，又是最高级的劳动力形态。作为上层建筑，意识以社会化的观念体系存在；作为劳动力，意识以个体在劳动中实际调用的认知、判断、决策能力存在。我们还论证了上层建筑的本质是历史性凝结——旧的经济基础中那些被时代局限所束缚、无法在当时释放的劳动力潜能，通过人类的实践活动，以法律、政治、宗教、艺术、哲学等形式被固定下来，成为跨越时代的“潜能仓库”。【需要进一步明确的是，这个“潜能仓库”所储存的潜能是中性的——它本身没有阶级属性，只是人类历代劳动留存的“社会劳动储备库”。它不会自动发挥作用，必须通过当下的活劳动去激活。】

现在，我们需要在这个地基上，完整地揭示从“决定”到“反作用”的传导机制。

第一节 “决定”的真实含义：规定什么能被释放，什么必须被雪藏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如果我们将“决定”理解为经济基础像刻印章一样，把自己的内容直接印刻在上层建筑上，那我们就永远无法理解为什么同一个经济基础可以对应不同的上层建筑，也无法理解为什么上层建筑一旦形成就具有超越其原初经济基础的惯性。

“决定”的真实含义不是“生产”，而是“划界”。

任何一个时代的经济基础——即那个时代占主导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总和——都在做两件事。第一件事是释放：它把劳动力从混沌的自然状态中组织起来，使其投入现实的生产过程。没有这种释放，社会就无法运转，文明就无法延续。第二件事是雪藏：任何经济基础都只能在特定的生产力水平上运转，它只能释放那些在现有技术条件下能够被有效组织的劳动力，而将那些暂时无法被有效利用的劳动力潜能排斥在现实生产过程之外。这不是经济基础“不愿意”释放，而是“不可能”释放——因为释放需要物质条件，而条件尚未成熟。

雪藏不是消灭。被雪藏的劳动力潜能不会消失，它们只是暂时找不到进入现实生产过程的通道。这些被堵在通道之外的潜能，必须寻找出路。它们不能一直悬在空中，它们需要附着、需要沉淀、需要某种社会形式来承载自己。而这条出路，就是上层建筑。

因此，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方式是：它通过规定“什么能被释放、什么必须被雪藏”，划定了意识潜能的流向。那些被释放的部分，进入现实的生产过程，成为看得见的财富；那些被雪藏的部分，则通过人类的实践活动——劳动、斗争、交往、创造——凝结为法律、政治、宗教、艺术、哲学等上层建筑形态。值得注意的是，这里凝结出的上层建筑包含两个维度：政治上层建筑（法律制度、国家机器）以全体劳动力的历史性凝结为基础，更直接地服务于当下的统治秩序；思想上层建筑（道德、文化、价值观）则以意识劳动力的历史性凝结为主，更多储存着被压抑的、等待未来激活的潜能。两者共同构成了“仓库”的全部内容。上层建筑的内容不是经济基础“告诉”它的，而是经济基础“逼”出来的——它是被时代的生产力水平所限制、所排斥、所悬置的那部分劳动力潜能的落脚之地。

我们可以用一个比喻来帮助理解。一条河流的水量远远大于河道所能容纳的流量。河道就是经济基础——它规定了水可以流向哪里、以多大的流量流动。那些流不过去的多余的水，不会消失。它们会渗入两岸的土地，形成湿地、沼泽、湖泊，甚至改变整个流域的生态。这些湿地、沼泽、湖泊，就是上层建筑。它们不是河道“生产”出来的，而是河道“逼”出来的——它们是那些无法进入河道的水的归宿。当气候变迁、降雨增加，或者河道被人为拓宽，这些原本储存在两岸的水就可以重新汇入河道，成为新的流量。

在这个比喻中，水就是劳动力的潜能；河道就是经济基础——它规定了潜在在当下可以被释放的规模和方向；两岸的湿地、沼泽、湖泊就是上层建筑——它们是那些暂时无法进入河道的潜能的储存形式。但必须强调，这个比喻中的“湿地、沼泽、湖泊”并非纯粹的自然沉淀物，而是阶级斗争的沉积场。谁掌握了当下的活劳动，谁就能引导这些积水的流向——统治阶级用立法、行政、教化等活劳动将其引向维稳；被剥削阶级在质变来临时，同样用自身的活劳动将其引向革命。这个比喻并不完美，但它至少说明了一个关键点：上层建筑不是经济基础的“反映”或“复制品”，而是经济基础无法容纳的那部分劳动力潜能的结晶。

第二节凝结的过程：被雪藏的潜能如何变成上层建筑

现在，我们需要更具体地回答：被经济基础雪藏的劳动力潜能，究竟是如何变成法律、政治、宗教、艺术、哲学这些上层建筑形态的？这个过程不能停留在隐喻层面，必须揭示其物质性的传导机制。

第一步，是实践中的外化与遭遇阻力。劳动者的意识在劳动实践中被调用，试图改造世界、实现目的。但在每一个具体的历史时代，这种调用都受到生产条件、技术水平和阶级关系的限制。一个中世纪工匠想设计一种更高效的纺织机械，他的意识中已经有了模糊的图景，但当时的金属加工技术无法实现他的构想，封建行会制度也不允许他擅自改变生产规范。他的意识潜能无法在“生产”这条通道上兑现，于是它转向了其他通道。

第二步，是社会化与客观化。单个工匠被雪藏的意识潜能如果不被表达、不被分享，就会随着他的死亡而消失。但人类是会交流、会记录、会传承的动物。那个工匠可能把他的构思画在草图上，可能讲给徒弟听，可能在行会的讨论中提出。这些表达行为将个体性的意识潜能转化为社会性的存在——它进入语言、进入图像、进入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和争论。在这个过程中，意识潜能开始脱离原初的个体大脑，附着在各种物质载体上：羊皮纸、石碑、建筑物、乐器、仪式动作。

第三步，是筛选与结晶。不是所有被表达的潜能都能被保留下来。社会是一个巨大的筛选机制。那些与当时统治阶级利益相冲突的表达可能被压制、被销毁；那些过于超前、同时代人完全无法理解的表达可能被遗忘；而那些能够回应社会普遍焦虑、能够为多数人提供意义框架、能够在权力结构和日常生活的缝隙中找到立足点的表达，则会被反复传播、反复引用、反复阐释。在这个筛选过程中，最“成功”的那些表达逐渐固化下来，成为规范、成为教

条、成为经典、成为“常识”。它们从流动的意识活动，凝结为稳定的社会形式——法律条文、宗教信条、艺术风格、哲学范畴。

第四步，是独立化与反向支配。一旦这些凝结物形成，它们就获得了相对于原初意识活动的独立性。法律条文一旦被写下来，就不再依赖于当初写下它的那个立法者的意识；它成为一套客观的、可援引的、可强制执行的规则。宗教教义一旦被编成典籍，就不再依赖于当初那个先知的内在体验；它成为一套外在于任何个体的、要求信徒服从的真理体系。这种独立化意味着：上层建筑一旦形成，就成了一个“物”——它有自己的逻辑、自己的惯性、自己的生命。它不仅存储着被雪藏的劳动力潜能，还反过来规训活着的意识：法律告诉人们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宗教告诉人们什么是对、什么是错；艺术告诉人们什么是美、什么是丑；哲学告诉人们什么是真、什么是假。

这就是“凝结-存储-释放”机制的核心。上层建筑不是观念的幽灵，而是劳动力潜能以社会形式存在的物质性仓库。

第三节 释放的条件：技术和生产如何打开仓库的大门

上层建筑一旦凝结，就获得了相对独立的存在。它可以跨越时代，从一个历史阶段传递到另一个历史阶段。但它的存在本身不是目的——存储是为了释放。上层建筑中凝结的劳动力潜能，只有在新的物质条件下被重新激活，才能真正发挥“反作用”。

那么，释放的条件是什么？

最根本的条件，是当下活劳动对历史潜能的激活。劳动力本身——活的、正在进行的劳动——才是打开仓库大门的钥匙。技术不是孤立的外在原因，它是人类劳动力释放程度的精确标尺，是劳动力激活历史潜能的物质媒介，而不是释放本身的原因，更准确地说，技术划定的是释放的“上限”——技术决定了潜能最多能被释放到什么程度。无论活劳动多么活跃、多么有创造力，一旦触及技术水平的边界，释放就遭遇天花板。技术设定了可能性的最高边界。而在这个边界之内，活劳动决定释放的具体情况和方向——哪些潜能被激活、如何被转化、朝什么方向释放。每一次重大的技术革命，都意味着劳动力可以以新的方式被组织、被调用、被放大——但技术革命本身是劳动力发展的结果，而非源头。蒸汽机释放了此前被束缚在自然力和人力中的生产潜能，但释放的动力来自劳动者的需要和实践；电力将这种释放推向了一个新的量级，但其根源仍然是劳动力对更高效生产方式的追求。技术的进步不仅仅释放“当下”的劳动力——它也通过劳动力的当下激活，打开了那些被锁在上层建筑中的历史潜能的仓库。

为什么？因为劳动力的激活改变了“可释放”的阈值。一个在中世纪只能停留在工匠头脑中的纺织机械构想，在工业革命的条件下，通过工业时代劳动者的实践、试错、改良，变成了实际运转的珍妮纺纱机。一个在古代只能写在竹简上的“天下为公”的理想，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条件下，通过后世劳动者的制度设计、社会实践、理论发展，成为现实社会制度的设计参考。一个在资本主义早期只能作为乌托邦空想的“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愿景，在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高度发展的今天，通过当代劳动者的探索、实验、斗争，开始显现出可操作性的轮廓。在这些过程中，技术是中介，劳动力是动力。

劳动力的激活打开仓库的方式不是自动的、机械的。上层建筑中凝结的潜能不会因为技术出现了就自己跑出来。它们需要被当下的活劳动所“认出”、被“接引”、被“转化”，甚至是被改造。这就是“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的微观机制：当新的生产方式开始形成，当新的劳动实践开始展开，人们会回过头去（或向别处看去），从历史留下的或空间上并存的上层建筑中寻找资源、寻找灵感、寻找合法性。

这里必须指出，这种“激活”不仅发生在时间的纵轴上——从过去到现在，跨越时代；

也发生在空间的横轴上——从一种生产方式、一个地区、一种文明迁移到另一种。马克思主义从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法国空想社会主义中汲取思想资源，这是空间上的迁移（从不同国家的思想传统中借用）。资本主义初期的自然法观念从古罗马法中汲取资源，这是时间与空间的双重迁移（从古代罗马到近代欧洲）。文艺复兴“复兴”古希腊罗马的文化遗产，同样既是时间的跨越，也是空间的迁移——那些被尘封的潜能从地中海文明的故纸堆中被重新打捞，在意大利的城市土壤中被激活。

此外，这种“激活”也不必是“跨越时代”的宏大叙事。它同样可以发生在微观的时间尺度上：前一秒被固化的经济基础状态，后一秒就可能被新的活劳动所激活。任何固化——无论是几秒前形成的市场交易记录，还是几分钟前产生的生产数据——相对于“绝对当下”的流动实践而言，都是“旧的”，都可以在下一秒被重新激活、重新调用、重新转化为现实的力量。微观尺度上的激活，与宏观尺度上的时代跨越，遵循的是同一套逻辑：活劳动是唯一的动力，固化的潜能只是待点燃的燃料。

文艺复兴“复兴”的是古希腊罗马的文化遗产，但文艺复兴不是回到古希腊，而是用古希腊的思想资源来冲破中世纪神学的束缚，为资本主义的兴起开辟道路。启蒙思想家从古罗马法中汲取了“自然法”的观念，用这些被尘封了上千年的思想武器来批判封建专制。马克思主义从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法国空想社会主义中汲取了思想资源，但这些资源在被马克思重新激活之前，已经作为上层建筑存在了数十年乃至上百年。

这种“回溯性激活”之所以可能，正是因为上层建筑中凝结的不仅仅是观念，而是旧时代被雪藏的劳动力潜能。当一个当代工程师读到一本几百年前的工程手稿，他从中学到的不是“古人的意见”，而是古人面对类似技术难题时的判断思路、试错经验和解决方案。这些思路、经验和方案，是古人意识潜能的客观化结晶。当代工程师用自己的意识去激活它们，将它们转化为解决当下问题的能力——这就是劳动力潜能的跨时代（以及跨空间、微观时间尺度）释放。

第四节 反作用的本质：被释放的经济力量，而非观念的力量

现在，我们可以回答那个最核心的问题：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这个“反作用”究竟是什么性质的？

传统理论在这一点上往往表述得极其谨慎：说它“起作用”，但不说明它如何起作用；说它“不是最终决定因素”，但不说明它到底是什么因素。这种谨慎在政治上是必要的，但在理论上是不充分的。如果反作用不能还原为某种物质性的力量，那它就只能是观念的力量——而一旦承认观念有独立的力量，唯心主义的后门就永远关不上了。

本书的论证指向一个确定的结论：上层建筑的反作用，不是观念的力量，而是经济力量。它是在当下活劳动的激活下，从上层建筑中被重新释放出来的、属于旧经济基础的劳动力潜能，以新的形式作用于新的经济基础的过程。

让我们把这个命题拆解开。

“不是观念的力量”——这不是说观念不起作用，而是说观念的力量不是来自“观念”本身的某种神秘属性。一种观念之所以能够影响人的行为、改变社会进程，不是因为它是“正确的”“高尚的”“有感染力的”，而是因为这种观念中凝结着被固定下来的、真实的劳动力潜能。当人们接受一种观念时，他们不是在被动地接受某种精神实体，而是在激活自己的意识去理解、认同、转化那些凝结在观念中的前人经验、判断和智慧。这个过程是物质性的一一它发生在大脑中，表现为神经元的连接和放电；它表现为人的行为改变，表现为新的劳动

技能的习得、新的生产组织的建立、新的社会关系的形成。

“而是经济力量”——被激活的劳动力潜能，一旦投入现实的生产过程，就会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财富。一个人从一个哲学观念中获得启发，设计出一种新的生产流程，这个新流程提高了生产效率，创造了更多的使用价值。这种效率的提高和价值的创造，是经济力量，不是观念力量。观念只是中介，真正的能动者是活的人的意识及其所调动的历史凝结。

“在新的技术和生产条件下”——这是释放的物质前提，但真正的钥匙是当下活劳动对历史潜能的激活。上层建筑中的潜能不会自己跑出来。技术在这里扮演的角色是“上限划定者”：它决定了潜能释放的最高可能边界——技术上限越高，可被释放的潜能空间就越大。中世纪工匠的纺织机械构想之所以无法兑现，不是因为工匠不够努力，而是因为当时的技术上限根本不允许那样的机器成为现实。但技术不是释放的原因；在技术允许的范围内，是活劳动——劳动者的实践、试错、斗争、创造——决定哪些潜能被激活、如何被转化、朝什么方向释放。当新的工具、新的工艺、新的组织形式出现时，从前无法兑现的那些潜能就获得了兑现的可能性；但将这些可能性转化为现实，仍然需要当下活劳动的接引、转化与改造。文艺复兴时期的人能够“复兴”古希腊文化，不是因为古希腊文化突然变得更有道理了，而是因为资本主义萌芽创造了对新的思想资源的社会需求，同时印刷术的普及使古籍的传播成本大大降低——但将这些思想资源转化为冲破封建神学的武器，是文艺复兴时期活的人的意识（艺术家、学者、商人、银行家）的功劳。

“从上层建筑中被重新释放出来的、属于旧经济基础的劳动力潜能”——这不是说上层建筑中只有旧经济基础的潜能，而是说上层建筑作为历史性凝结，主要存储的是那些在旧经济基础条件下被雪藏的潜能。这些潜能带着旧时代的烙印——它们可能体现为前一个时代的价值取向、审美偏好、认知框架。但当它们被重新释放时，它们不是简单重复旧时代的内容，而是在与新条件的碰撞中发生转化、变形、升级。

“以新的形式作用于新的经济基础”——被释放的潜能不会原封不动地嵌入新的经济基础。它必须经过筛选、改造、重组，才能适应新的生产力水平。封建时代的平等观念在被资产阶级继承时，被剥离了其封建外壳，注入了商品交换的平等逻辑。空想社会主义的构想在被马克思主义改造时，被从道德批判转化为科学分析。这种“形式的更新”本身就是意识活动——是活的人的意识在对历史遗产进行批判、取舍、重构。

因此，我们可以用一个公式来概括上层建筑反作用的完整机制：

当下的经济基础通过“释放/雪藏”机制，将无法容纳的劳动力潜能凝结为上层建筑；当技术和生产条件进步到一定程度（技术设定了释放的下线），这些被雪藏的潜能被当下的活劳动所激活（活劳动决定释放的上线和方向），以经济力量的形式作用于新的经济基础。

这个机制有四个关键环节：雪藏（经济基础划界）→ 凝结（潜能固化为上层建筑）→ 条件成熟（技术进步与物质条件的积累，设定释放的可能边界）→ 激活（当下活劳动对潜能的接引、转化与改造，决定释放的现实走向）。每一个环节都是物质性的、可分析的、不依赖于“观念的神秘力量”的。

为了检验这个机制的解释力，我们可以用最经典的案例——欧洲文艺复兴——来做一个快速的验证。

文艺复兴的上层建筑是什么？是对古希腊罗马文化的重新发现和研究。古希腊罗马的哲学、艺术、法律、科学，被欧洲人重新翻开、重新翻译、重新阐释。

这些文化产品是怎么来的？它们是古希腊罗马经济基础的产物。在那个奴隶制城邦时代，一部分人被从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他们的意识有更多余裕去探索哲学、艺术、科学。但这些探索的成果，大部分在当时是无法兑现为生产力的——古罗马的工程技术远超中世纪初期欧洲的水平，但当时的奴隶制经济无法将这些技术推广到全社会；古希腊的民主思想更是与中世纪封建等级制格格不入。因此，这些文化成果在当时就被“雪藏”了——它们以文献、

建筑、雕塑的形式凝结下来，成为上层建筑。

这些潜能什么时候被释放？当中世纪后期欧洲的生产力开始复苏，城市兴起，商业扩张，资本主义萌芽出现。技术条件达到了释放的下线——印刷术的普及使古籍的传播成本大大降低，造船和导航技术使远洋贸易成为可能。但将这些潜能真正激活、转化为现实力量的，是当下活劳动——意大利的商人和银行家需要不同于教会法的商业规范，新兴的城市需要不同于封建制度的政治组织形式，文艺复兴的艺术家需要不同于宗教题材的表现对象。于是，人们开始回过头去，从古希腊罗马的文化遗产中寻找资源，用当下的活劳动去“认出”、接引、转化、改造那些被尘封的潜能。

这些被释放的潜能以什么形式发挥作用？它们不是直接搬用古希腊罗马的现成答案，而是被改造、被转化。佛罗伦萨的市民从罗马法中找到了“共和”的理念，但他们建立的不是罗马式的奴隶制共和国，而是城市贵族和商人主导的城邦国家。文艺复兴的艺术从古希腊雕塑中学习了透视法和人体比例，但他们画的不再是希腊的神祇，而是圣母、商人、甚至自己的肖像。这种“旧瓶装新酒”的创造性转化，正是活的人的意识在激活历史凝结时的典型表现。

这个释放过程产生了什么样的经济后果？它塑造了新的主体——具有独立人格、追求世俗成功、敢于冒险和创新的“新人”。这些新人的意识和劳动力，成为资本主义早期发展的核心动力。文艺复兴不是资本主义的原因，但它是资本主义兴起的思想条件——而这个“思想条件”的本质，不是观念本身的力量，而是被重新激活的、古希腊罗马时代被雪藏的劳动力潜能，以转化后的形式注入到新的生产方式之中。

这不是观念决定论。如果欧洲没有经历黑死病后的人口重组、没有远洋贸易带来的财富积累、没有印刷术带来的信息传播革命，仅仅靠“复兴古希腊文化”本身，不可能催生资本主义。文艺复兴之所以能够发生并产生深远影响，是因为技术和生产条件已经进步到可以“接住”那些从前被雪藏的潜能（技术设定了下线），而当下活劳动（艺术家、学者、商人、银行家的实践）则决定了这些潜能以什么方式被激活、朝什么方向释放。观念只是载体，真正的力量是劳动力潜能本身及其当下的激活。

这个案例展示了上层建筑反作用的完整逻辑：旧经济基础中被雪藏的潜能→凝结为上层建筑→新生产条件下（技术设线，活劳动激活）→转化为新经济基础的动力。它不是观念的力量，而是经济的力量——是被固定下来的、跨越时代的经济力量。

至此，我们完成了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这一经典命题的机制性重构。这一重构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填补了一个理论空白，更在于它彻底消除了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唯心主义后门”。

在传统解释中，无论我们如何强调“反作用”，只要这个反作用的机制没有被揭示，它就始终笼罩着一层神秘色彩。批评者可以说：“你们马克思主义者嘴上说经济决定一切，但一碰到文化、宗教、意识形态这些‘上层建筑’发挥作用的时候，就不得不承认观念有独立的力量——这难道不是向唯心主义投降吗？”

这个批评之所以有杀伤力，不是因为它正确，而是因为我们长期缺乏一个有力的回应。我们只能说“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但经济基础是最终决定因素”——这个回应在逻辑上是自洽的，但在机制上是空洞的。它没有告诉我们“反作用”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因此也无法反驳“观念有独立力量”的指控。

而我们现在指出了这个缺失的机制：上层建筑的反作用，是旧经济基础中被雪藏的劳动力潜能，在技术进步设定了释放可能性的前提下，通过当下活劳动的激活，被重新释放、转化为经济力量的过程。在这个机制中，没有任何环节需要诉诸“观念的神秘力量”。意识、观念、文化，都是劳动力潜能的载体和中介，而不是独立于物质世界之外的能动者。当一个人被一个观念打动，不是因为他被某种精神实体“感染”了，而是因为他的意识在理解、消

化、转化那个观念中凝结的前人经验的过程中，产生了新的判断和行动能力。这个过程是物质性的，它发生在大脑中，表现为神经元的活动；它发生在社会中，表现为劳动效率的提高、生产组织的变革、社会关系的调整。

第三章 作为劳动力的意识：不可支配的边界

在《双重视阈》中，我们揭示了一个看似矛盾的现象：用户在数字平台上的每一次浏览、点击、停留，都在为平台无偿生产数据资产，而用户本人却得不到任何报酬（张皓翔，2026b）。在《要素的枷锁》中，我们确立了另一个核心命题：作为劳动力的意识不可剥削（张皓翔，2026a）。

这两个判断之间曾经存在一道理论裂缝。经过第一章的详细界定，现在可以明确：作为劳动力的意识（那种在具体情境中做出特异性判断、不可复制的决策、赋予独有意义、设定独到方向的能力）与意识劳动（按外部规划、有既定流程、可分解为步骤的脑力支出）是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劳动力。混淆这两者，就会误以为资本能够对前者施加某种支配——无论是剥削还是被有效支配。本章的任务是证明：作为劳动力的意识，因其根本性的不可还原特征，既不可被剥削，也不可被资本有效支配。资本在数字平台上实际支配的，始终是意识劳动及其产物。

第一节 两种劳动力：意识劳动与作为劳动力的意识

意识劳动，是指按外部规划、有既定流程、可分解为步骤的脑力支出。编写代码、绘制标准图纸、撰写格式报告、按照算法要求进行数据标注、在平台上按推荐流浏览点击——这些都是意识劳动。它的核心是“智力”，是“解决问题的能力”，是“按照要求产出成果的能力”。意识劳动可以被分解为标准化环节，可以被不同的人以相同的方式执行，其产物可以被衡量（代码行数、图纸张数、报告页数、点击次数、停留时长），可以被占有，可以被剥削。资本可以通过任务分配、绩效规训、算法引导等方式，对意识劳动的过程及其产物进行系统性的支配。

作为劳动力的意识则与此完全不同。它指的是人脑所固有的、能够在具体情境中做出特异性判断、不可复制的决策、赋予独有意义、设定独到方向的能力。它不是按部就班的智力运算，不是在外部分规划下执行的脑力任务，而是那种带有鲜明主体性印记的能力：它在每一个具体的历史处境中都是独一无二的，无法被分解为可重复的操作步骤，无法被外部程序所替代，拒绝被纳入任何统一的度量衡。它的每一次调用都带有不可还原的独特性——换一个人、换一个时间、换一个条件，同样的“输入”不会产生同样的“输出”。这种能力内在于人，与人的生命活动不可分离。你无法把它从人的大脑中抽出来，像搬走一块砖一样搬走它。当一个人在做战略决策时，这个决策活动本身——那个综合了经验、直觉、价值权衡的过程——是无法被拿走的。你可以拿走他决策的结果（方案、指令、记录），但拿不走他做出决策的那个能力本身。

这两个概念不是同一个东西的“潜能”与“使用”。它们是两种不同性质的劳动力。一个人可以在进行意识劳动时完全不调用作为劳动力的意识——比如机械地按照手册填写表格；也可以在调用作为劳动力的意识时完全不进行意识劳动——比如做出一个战略决策，这个决策本身不是按流程产出的“成果”，而是方向性的、不可复制的抉择。两者可以同时发生，也可以各自独立发生，但绝不能混为一谈。

资本对意识劳动及其产物的剥削是现实存在的，我们在《双重视阈》和《要素的枷锁》

中已经详细分析。但资本能否对作为劳动力的意识施加类似的支配？答案是否定的。以下第二节将系统论证这一点。

第二节 作为劳动力的意识：为什么不可被资本支配

要理解为什么作为劳动力的意识不可被剥削、也不可被资本有效支配，需要从以下几个根本特征入手。

一、不可复制性与资本引导的失效

资本要支配一种劳动力，必须能够对其施加某种形式的引导或规训——无论是通过时间纪律（工厂的钟声）、绩效指标（KPI）还是算法推荐（点击率优化）。这些支配方式的前提是：被支配的对象具有可重复性和可预测性——即同样的刺激应当能够产生大致同样的反应，同样的输入应当能够产生大致同样的输出。

作为劳动力的意识恰恰拒绝这种可重复性。它的每一次调用都是独一无二的，带有不可还原的主体性印记。一个战略决策之所以成功，往往是因为它打破了常规、超越了既有框架、在不可复制的历史处境中做出了唯一正确的选择。这种能力无法被“训练”——你可以训练一个人掌握更多的知识和技能（那是意识劳动的范畴），但你无法训练他在关键时刻做出那个不可复制的“跳跃”。资本无法通过任何形式的规训或算法来确保：给定某种输入，作为劳动力的意识就会产生某种特定的输出。因为它的本质就是拒绝被预测。

因此，资本对作为劳动力的意识的“引导”尝试，最多只能触及它的外围——改变其调用环境、提供信息输入、设置选项范围——但无法决定其内核：那个最终的、不可复制的判断本身。然而，必须做一个更精确的表述：资本不是“绕开”这种能力，而是“无视”它。在资本的核算体系中，作为劳动力的意识不产生可被提取的数据，不被纳入绩效指标，不被任何薪酬模型所定价。资本不需要“消解”它——资本只需要假装它不存在，只需要设计出不需要它的生产流程，只需要将劳动者训练为不依赖它的机器。外卖骑手的判断力没有被夺走，但在算法的调度下，它不被调用、不被承认、不被视为有价值的贡献。程序员的创造力没有被废除，但在标准化的开发流程中，它被压制、被闲置、被排除在生产过程之外。能力本身始终在那里，始终是劳动者夺回自主权的根基。资本能做到的，是创造一个不让这种能力发挥作用的环境——但它无法消解能力本身。这正是为什么最伟大的科学发现、艺术创作、战略决策往往诞生于资本逻辑的缝隙之中，而不是被资本规划出来的。

二、不稳定产出与不可商品化

资本在市场上购买任何一种劳动力商品，都预设了一个前提：这种劳动力的产出是相对稳定、可预期、可重复的。工厂主雇佣工人，知道在给定的时间内，工人大致能生产出多少产品；软件公司雇佣程序员，知道在给定的需求文档下，程序员大致能写出符合规格的代码。正是因为产出的稳定性和可预期性，资本才愿意为这种劳动力支付价格，并将其纳入成本-收益的计算体系。

作为劳动力的意识则完全颠覆了这一前提。它的产出——那个在具体情境中涌现的特异性判断、不可复制的决策、方向性的意义赋予——是高度不稳定的。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情绪状态、不同的环境压力下，可能做出完全不同质地的判断。甚至可以说，这种能力之所以宝贵，恰恰在于它拒绝稳定产出：真正卓越的战略决策往往是在不可复制的历史关头诞生的，而不是在按部就班的日常流程中产生的。

这种不稳定性直接导致了两个后果。第一，不可复制性意味着作为劳动力的意识拒绝被格式化和标准化。任何试图将其转化为固定流程的操作，都会扼杀它的独特性。第二，不可重复性意味着它拒绝被衡量和计价。你无法像计算“单位时间产出”那样，为一个无法重复出现的判断计量。

因此，作为劳动力的意识从一开始就无法进入商品的行列。它不是“难以定价”的商品，而是根本就不是商品。资本不会为它支付价格，不会将其作为商品来购买，更不会将其纳入常规的生产流程。

至此，一个常见的问题需要澄清：马克思提出的三重定价标尺——生存成本、繁衍成本、教育培训成本(马克思，2009：199)——是否可以用来衡量作为劳动力的意识？答案是否定的。这套标尺的适用对象是“劳动力商品”，即那些已经进入市场交换体系的劳动力。而作为劳动力的意识根本就不是劳动力商品，从未进入过那个体系，因此三重定价标尺与它没有任何关系。试图用这套标尺去衡量它，就像用体温计去测量声音的频率——工具与对象之间不存在任何对应关系。资本面对这种能力时，连“定价”这个最基础的操作都无法启动，因为定价的前提是对象已经被承认为商品。

资本唯一能做的，就是通过标准化流程、算法推荐、绩效规训来尽可能消除生产过程中对它的依赖，创造一个不让这种能力发挥作用的环境。但这恰恰证明了资本无法支配这种能力本身——它能压制，但不能消解；能无视，但不能占有。

三、对“脑机接口”质疑的回应

有人可能会提出：随着脑机接口等技术的发展，未来是否可能通过直接放电来控制人的意识，从而推翻“作为劳动力的意识不可支配”的结论？这一质疑需要被认真对待。关键在于区分被控制的对象是什么。脑机接口能够影响或操控的，是意识活动中的可流程化、可预测的部分——即我们所说的意识劳动。它可以引导注意力、触发某些神经回路、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模拟决策过程。但它无法触及作为劳动力的意识的核心：那种高度主体性、个体化、不可复制、依赖于具体情境的判断能力。即使技术能够精确刺激每一个神经元，它也无法复制一个人在特定历史处境中、带着全部生命经验所做出的那个不可复制的“跳跃”。因为这种能力不是一组可以被拆解的神经信号，而是与个体的生命史、情感、价值立场、环境机缘不可分离的整体涌现。试图通过放电“控制”作为劳动力的意识，就像试图通过精确控制每一个颜料分子来复现一幅画的神韵——技术上或许可以复制像素，但永远无法复制那个创造性的瞬间。因此，脑机接口的发展非但不能证伪我们的结论，反而从反面印证了：资本能够支配的始终是意识劳动，而作为劳动力的意识始终是它无法跨越的界限。

第三节 资本无法掌控的力量：与非物质劳动理论的对话

在这里，我们需要与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的“非物质劳动”理论进行一次深入的对话。以哈特、奈格里以及拉扎拉托等人为代表的理论家，在世纪之交提出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论断（哈特，奈格里，2008：31）。他们敏锐地观察到，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劳动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转型：从传统的物质生产转向信息、知识、情感、交流、关系等非物质产品的生产。在这种新的劳动形态中，资本剥削的对象不再仅仅是工人的体力或标准化技能，而是扩展到语言、情感、知识、社会关系这些“共同性”的层面。劳动变得更加生命政治化——它直接作用于人的主体性、交往能力和生命本身。在哈特和奈格里看来，这种扩张是全面的、无孔不入的：资本正在吞噬一切，包括人的内心世界和社会生活的毛细血管（哈特，奈格里，2008：32）。

我们的分析与这一理论谱系共享同一个诊断对象，但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结论。我们承认，数字资本主义确实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渗透到人类生活的最细微处。算法推荐、绩效规训、数据提取——这些操作使得意识劳动及其产物被大规模剥削。然而，正是通过对“意识劳动”与“作为劳动力的意识”的严格区分，我们发现了一个非物质劳动理论未曾触及、甚至在其框架内无法想象的边界。

两种理论的首要分歧，在于对资本扩张边界的判断。非物质劳动理论倾向于描绘一幅

资本不断突破界限、征服新领域的图景——从工厂到社会，从劳动时间到生命时间，从物质生产到情感生产，资本似乎没有终点（哈特，奈格里，2008：33）。在这种叙事中，资本如同一台无往不利的推土机，碾碎一切障碍，将整个世界纳入其运行轨道。而我们通过区分意识劳动与作为劳动力的意识，指出：资本扩张的极限恰恰存在于它自身运行所依赖的那个内核之中。资本可以无限地拓展意识劳动的规模，可以不断发明新的方式去引导、规训、剥削意识劳动的产物，但它永远无法生产、购买或占有作为劳动力的意识——那种在具体情境中做出不可复制判断的能力。这不是一个“尚未征服”的边疆，而是一个在存在论上就无法征服的飞地。资本越是试图将一切纳入计算，就越暴露出它无法计算的东西正是其运行的前提。

其次，两种理论对劳动的理解层次不同。非物质劳动理论对“智力劳动”或“情感劳动”的分析，往往停留在劳动的产品——信息、知识、情感、交流——的非物质性上。他们关注的是这些产品如何被资本占有，如何成为新的剥削对象。然而，这种分析未能深入到劳动力本身内部的分化。我们则指出，在一切非物质劳动（即我们所说的意识劳动）的根源处，存在着一个质的断裂：一部分智力可以被流程化、标准化、被算法替代——这是意识劳动；另一部分智力因其不可复制性和不稳定产出，永远拒绝被资本捕获——这是作为劳动力的意识。非物质劳动理论将这两者混为一谈，因此无法解释为什么资本在无所不在地扩张的同时，却始终无法真正掌控人类最核心的创造性判断能力。

两种理论对革命主体的理解也存在根本差异。在哈特和奈格里那里，从事非物质劳动的“诸众”具有成为革命主体的潜能，但这种潜能的实现路径并不清晰。他们的分析更多地停留在对资本主义权力结构的批判和对一种“出离”（*exodus*）的想象上——从资本权力中逃离，在逃逸中创造新的社会形式（哈特，奈格里，2008：61）。而我们的理论给出的不是“出离”，而是“夺回”。夺回对劳动力生产的实际掌控能力——这不是逃到别处去，而是在资本已经全面渗透的领域中——教育场、工作场、生活场——正面夺回自主权。夺回不是逃避，而是正面交锋；不是创造飞地，而是改造现有的生产领域本身。我们的革命主体也不是抽象的“诸众”，而是被资本逻辑之下对劳动力生产与再生产的实际掌控能力系统性丧失的每一个人：在标准化学历中迷失方向的学生，在算法调度下耗尽精力的骑手，在碎片化娱乐中丧失注意力的用户，在绩效规训下自我剥削的打工人。他们的斗争不是逃离，而是夺回：夺回教育内容的选择权，夺回劳动节奏的决定权，夺回闲暇时间的支配权，夺回自身数据的控制权。

最后，两种理论对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的评估截然相反。非物质劳动理论中的许多版本隐含着一种悲观主义：资本正在吞噬一切，主体性的反抗越来越困难，任何逃逸都可能被重新捕获。我们则提出一个相反的趋势判断：数字资本主义的发展，正在孕育出它无法掌控的力量。随着人工智能代劳了一切可程序化的意识劳动，生产过程中唯一剩下的、只有人才能提供的变量，恰恰就是作为劳动力的意识，越是发展人工智能为代表的这一类新的生产工具，越是这种生产力进步，就越要求作为劳动力的意识以正式的主导的地位参与生产之中，而资本不得不面对一个尴尬的事实：它无法有计划生产这种能力，无法购买这种能力，也无法预测这种能力。这种“资本的前提恰恰是资本无法控制的东西”的矛盾，构成了数字资本主义最深层的危机。它不是外部强加的危机，而是资本运行内在产生的危机——就像资本主义早期发展无法解决生产社会化与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一样，今天，资本面临的是“对不可计算之物的依赖”与“试图将一切纳入计算”之间的矛盾。

这一判断打开的不仅是可能性空间，更是一种辩证否定的视角。我们的分析揭示了一条非物质劳动理论未曾触及的逻辑：资本主义在无限扩张的过程中，不断排除那些无法被量化的东西，但最后发现，它排除掉的恰恰是维持其运行的前提。这不是外部强加的危机，而是资本内在矛盾的运动。

让我们把这个矛盾说得更具体一些。

在当今数字资本主义的发展中，人工智能、脑机接口等技术的突破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改变生产的面貌。机器可以编写代码，可以绘制图纸，可以诊断疾病，可以优化物流——一切可程序化的意识劳动正在被加速替代。生产过程对“人的体力”和“重复性脑力”的依赖急剧下降。那么，生产过程中最需要的，同时也是唯一剩下的、只有人才能提供的变量是什么？正是作为劳动力的意识——那种在具体情境中做出特异性判断、不可复制的决策、赋予独有意义、设定独到方向的能力。这是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发展条件下，资本越要发展就越高度依赖的东西，也是资本越无法正视，运用的东西。

技术越发展，这种能力就越被需要。因为当工具代劳了执行，当算法覆盖了常规，真正的价值创造越来越依赖于人在关键时刻的“那一跳”——不可预测的创意，不可复制的战略，不可量化的审美。人工智能可以写出工整的诗，但写不出杜甫在战乱中“感时花溅泪”的那种独一无二的生命体验与历史处境交织出的诗句；脑机接口可以读取神经信号，但无法复制毛泽东四渡赤水时在具体战场态势中涌现的直觉与决断。

然而，资本主义无法给这种能力一个正当的名头，无法给它一个恰当的位置，无法给它合适的报酬。资本实现掌控与剥削的一条铁律在于：劳动力首先成为商品，进而劳动过程本身在资本的控制下进行。然而作为劳动力的意识，就其性质而言无法被商品化；其产出与劳动过程具有随机性和高度不稳定性，更具备显著特异性，同时高度依赖劳动主体所处的具体的历史环境、社会条件与心理状态，因此无法在资本的控制下展开。于是资本无法为其安放恰当位置，无法以合适方式实现剥削，无法以正当途径完成控制，只能启用自身逻辑中最高级的应对方式：以沉默面对这一无法掌控的对象。这生动揭示出，数字化时代的资本正不断生产出一种自身无法掌握、无法驾驭、却力量极强的存在，即作为劳动力的意识。而在人工智能兴起的当下，生产力的发展愈发要求作为劳动力的意识以主导性、正式化的形态参与生产关系，甚至直接作为核心生产力，驱动生产进程向前推进。

但这样做，恰恰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因为作为劳动力的意识本身就是最高级的劳动力。当技术已经发展到可以代劳一切可程序化的劳动时，生产力的进一步跃升，恰恰取决于这种能力的解放和调用。资本打压它，就是打压生产力本身。这就是资本主义当前最深层的悖论：它赖以生存的技术进步，不断呼唤着一种它无法驾驭的力量；它越是打压这种力量，就越是在削弱自身运行的生产力基础。这构成了深刻的辩证矛盾：资本在自我增殖的运动中，恰恰不断孕育出自身无法驾驭、终将否定自身的掘墓力量。

这不是外部的批判，而是资本内在矛盾的运动。资本主义在数字时代的发展，不是“主动孕育”了自己的否定者，而是在技术的逼迫下，不得不让那种无法被要素化的劳动力站到历史舞台的中央——但它又不肯给它名分、位置和报酬，于是只能通过压制来掩盖自己的无力。而压制本身，就是生产力发展的枷锁。

因此，作为劳动力的意识，不是资本主动创造的救世主，而是资本逻辑自我矛盾中必然浮现的界限。它不需要资本“承认”它，它一直就在那里——在每一个劳动者的头脑中，在每一次不可复制的判断中，在每一个拒绝被算法完全规定的瞬间中。资本可以无视它，可以打压它，但无法消灭它。而随着技术的发展，它被压制的成本越来越高——因为生产力的进步越来越依赖于它的释放。

这就是辩证否定在当代的具体形态：资本主义的发展，使那种它无法驾驭的力量越来越不可或缺；它越是阻碍这种力量，就越是在给自己制造危机。这不是预言，而是正在发生的趋势。当每一次算法优化都在试图消除“不可控”的人为判断，而每一次创新突破又恰恰需要这种判断时，矛盾就在那里。当每一个劳动者在标准化的流水线上感到“自己的判断不被需要”，而社会的创造力却因此枯竭时，矛盾就在那里。

这个矛盾不会自动消失。但它的存在本身，就是解放的客观根据。因为当资本无法再通过压制来维持增长时，历史就会把选择权交还给劳动者：是继续接受被压制的状态，还是

夺回对自己劳动力生产的实际掌控能力？这不是道德号召，而是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技术的进步已经为后者准备了物质条件，剩下的，是劳动者自觉的行动。

几千年来压迫与剥削的总根源——劳动力要素化——将被它自己孕育出来的无法被要素化的力量扫进历史的垃圾桶。这不是外部强加的拯救，而是历史内在矛盾自我否定的必然结果。

如果资本永远无法掌控作为劳动力的意识，那么劳动者的解放就不能只是等待资本的“崩溃”或“让渡”，而是在当下开始直接诉诸那个始终未被资本收编的飞地。工人阶级的斗争，不仅是争取更高工资、更短工时——那些仍然在资本逻辑内部——更要是保卫和激活那种不可支配的判断能力本身。从这个意义上说，数字资本主义的发展非但没有消灭革命的可能性，反而将革命的条件凸显到了前所未有的清晰程度：当资本将一切可程序化的劳动都交给机器，剩下那个它无法替代也无法掌控的东西，正是人的本质力量最纯粹的显现。

这不是一种技术决定论的乐观，而是基于辩证否定观的内在分析——资本在无限扩张的过程中，不断排除那些无法被量化的东西，但最后发现，它排除掉的正是维持其运行的根基。于是，它要么自我瓦解，要么必须承认一个它不愿承认的事实：有些东西，永远不能被资本逻辑所收编。而承认这一点，就是解放的开始。

附录

引用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马克思. 资本论 (第一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4.

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M]//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恩格斯. 致康拉德·施米特[M]//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0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编写组.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23.

哈特, 奈格里. 帝国[M]. 杨建国, 范一亭, 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8.

张皓翔 . 要素的枷锁 [EB/OL]. 日内瓦 : Zenodo, 2026.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9753290>

张皓翔 . 双重视阈 [EB/OL]. 日内瓦 : Zenodo, 2026.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8879332>

问答

问 1: 你在书中严格区分了“意识劳动”与“作为劳动力的意识”。能否用最简洁的方式说明它们的本质区别？

答:

区别不在“高低”或“复杂程度”，而在“性质”。

· 意识劳动：可以按外部规划执行，有既定流程或可被标准化的智力支出。它的产出可以在某个已知的坐标系内被评价（代码行数、图纸精度、专业判断的正确率）。资本可以预期它的平均效果，并为其定价。

· 作为劳动力的意识：每一次调用都是在具体历史处境中涌现出的、不可还原的特异性判断。它不是“更高级的专业技能”，而是可能重新定义问题、打破既有框架、设定全新方向的能力。这种能力没有“同类样本”，无法被任何绩效指标逼近，也无法被契约事先界定。

问 2: 高端技术专家、战略顾问的创造性工作，难道不属于“作为劳动力的意识”吗？

答：

不。一位技术专家多年积累的经验，使其能在特定领域内做出远超常人的专业判断——这仍然是意识劳动，只不过是复杂、高端的意识劳动。因为：

- 他的判断可以在该领域的专业话语中被描述、被传授、被评估；
- 资本可以预期他“每年大约能解决多少个关键技术难题”；
- 他的产出与行业常规问题之间存在稳定的相关性。

而“作为劳动力的意识”恰恰拒绝这种可预期性。比如一位军事家在战局中做出的那个“四渡赤水”式的决断——它不是“更优的战役方案”，而是在不可复制的历史关头，重新划定了可能性的边界。没有任何培训或专家体系能够稳定地产出这种决断。

问 3：资本能否通过雇佣关系来支配“作为劳动力的意识”？

答：

不能。资本能够购买和支配的，永远是意识劳动——那些可以被写入岗位职责、可以被考核、可以被预期产出的事情。雇佣契约中写的“负责技术攻关”“参与战略决策”等条款，描述的仍然是可流程化的、专业领域内的智力活动。

而“作为劳动力的意识”的调用，从根本上拒绝被契约事先界定。你无法在合同里写：“每周至少产生一次不可复制的顿悟。”因此，资本从源头上就没有把它作为购买的对象。资本能做的，是创造一个不需要调用这种能力的工作环境，然后假装它不存在。

问 4：在日常完成意识劳动（如写代码、做分析）时，劳动者有时会突然冒出一个极具创造性的、不可复制的想法，并帮助公司解决了大问题。这不就是资本剥削了“作为劳动力的意识”吗？

答：

这是一个容易产生误解的关键点。我们需要区分两种情况。

第一种：劳动者是为了完成契约规定的任务，主动去调用自己的判断力、创造力。在这种情境下，他所调用的能力已经被组织进一个可预期的劳动过程——即使这个过程中有一些“灵感迸发”，它仍然服务于一个既定的、可描述的目标。这种调用，本质上仍然是意识劳动（尽管可能是高端的、富有创造性的意识劳动）。因为资本可以合理地预期：雇佣一个高级专家，他大概率会在合同期内产生有价值的创意。这种预期本身就说明，该能力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被规律化、被纳入了资本的核算框架。

第二种：劳动者在没有被要求、也没有任何预兆的情况下，偶然间“冒出”一个完全超出岗位职责和行业常规的想法。这个想法不是为解决某个既定问题而产生的，而是重新定义了问题本身。资本事先没有为这种可能性支付任何对价，事后也无法通过调整管理制度来稳定地复现这种“灵光一现”。

在第二种情况下，资本确实无偿占有了这个想法的成果，但这不是制度化的剥削，而是对一次不可控、不可契约的偶然事件的幸运占有。

- 剥削要求资本能够常态化地购买劳动力、支配其使用、占有其剩余价值。
- 而这里，资本无法“购买”这种偶然的灵光，因为它无法在合同里写下“每周至少要涌现一次不可复制的顿悟”。
- 这种占有无法被固化为规律，无法被订立为契约，因此不构成剥削关系，而是一种偶然的、无法被资本主动再生产的机会主义收获。

所以，不能因为偶尔捡到了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就断言资本能够剥削“作为劳动力的意识”。资本的剥削体系始终只能作用于那些可以被稳定预期、被契约化、被绩效管理的劳动力支出——也就是意识劳动。

问 5：那么，你说“作为劳动力的意识不可剥削”，这个“不可剥削”到底是什么意思？

答：

这不是在说“资本道德高尚不去剥削”，也不是在说“理论上有可能但现实中做不到”。

而是说：剥削这个概念，它的适用前提是对象已经成为劳动力商品。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剥削时，讨论的始终是那些已经进入市场、被资本购买、按一定时间或任务让渡使用权的劳动力。

而“作为劳动力的意识”根本就不是劳动力商品。它从未进入过那个交易体系，也永远无法进入——因为它的产出无法被预期、无法被衡量、无法被契约化。

因此，用“剥削”这个概念去套它，本身就是范畴错置。就像不能用“克扣工资”去描述一个从未被雇佣的人一样。

我所说的“不可剥削”，准确的意思是：它不在剥削逻辑的适用范围内。

问 6：那这种能力难道永远无法被资本收编吗？

答：

按照我的理论，是的。因为它拒绝可计算性，而可计算性是资本运行的前提。这不是一个“尚未征服的边疆”，而是一个在存在论上就无法被征服的飞地。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永远无法被社会性地组织和释放。它只是无法被资本组织和释放。我在《要素的枷锁》中已经论述过：在共产主义社会，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和劳动时间的自由支配，使得人们可以通过平等的协商来组织这种不可计算的劳动力。不是用价格信号，不是用绩效指标，而是通过具体的、情境化的、相互倾听的讨论——在每一个需要做出方向性判断的时刻，由当事人基于自己的主体性，同时尊重他人的主体性，共同决定如何调用这种最稀缺的能力。

资本的逻辑是“计算”，共产主义的逻辑是“协商”。前者永远无法容纳作为劳动力的意识，后者则恰恰是为它量身定做的组织方式。未来的可能性恰恰在于：当技术的发展使得一切可计算劳动都被机器替代后，这种不可计算的能力将成为社会生产中唯一稀缺的资源。届时，如何组织它的释放，将不再是资本的问题，而是劳动者通过协商实现自我解放的问题。

问题 7：将人类文明中灿烂的文化、宗教、制度还原为“劳动力的凝结”，是否是对人类文明的一种扁平化？

答：

这是一个非常深刻且重要的问题，我非常认同它所指向的担忧。如果我的论述仅仅意味着：一切上层建筑都只是“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中的功能凝结”，那么您的指责将完全成立——那不仅是对人类文明的扁平化，更是对马克思主义所设想的、以“自由人联合体”为目标的未来社会的彻底背叛。

然而，这里有两个决定性的要害，能够回应这一质疑。

第一，二者锚定的历史坐标截然不同。

您提到的“还原”，在我理论中的落脚点并非资本主义的劳动力市场，而是贯穿人类历史、

指向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劳动力”形态。在《要素的枷锁》与《意识的宣言》中，我反复强调了一个核心命题：“意识”本身不可衡量、不可计算。

- 资本逻辑下的“劳动力商品”必须可量化、可计价、可剥削——这是它运行的铁律。

- 而“意识”作为最高级的劳动力，恰恰因其不可量化、不可计价，而从根本上拒绝了资本的统治。

因此，将文化、宗教、制度等上层建筑视为以意识为核心的劳动力潜能的凝结，并不是将其贬低为资本增殖的工具，而是将其锚定在了一个更高的历史坐标系中：它们是“未来自由人”的潜能库，是人之为人的本质力量在历史长河中的沉淀。这不是扁平化，而是将其从资本的短期功利中打捞出来，赋予了超越时代的、属于“人”自身的价值。

第二，论证的视角从“文化表象”跃迁至“存在论根基”。

这个问题的核心分歧在于：我们究竟在哪个层面上定义“人”与“文明”？

如果仅从表象看，人类文明无疑是多彩的、无序的、充满偶然性的文化洪流。但我的追问更深层一层：这种“多彩”的根源是什么？

答案是——人的活动从一开始就是“经济的”，这里的“经济”绝非资本主义那种狭隘的、以利润为核心的孤立体系，而是指一种最广义的、人类独有的“改造世界、创造价值、推动历史”的实践活动。这不是否定文化，而是要为文化寻找一个更坚实的本体论根基。

因此，与其说“人因为拥有多彩的文化而成为人”，不如说：“人因为拥有以意识为核心的、独一无二的劳动能力，才有了创造多彩文化的可能性。”

- 表层观点：人的本质在于他所创造的文化成果（艺术、宗教、制度等）。

- 深层（存在论）观点：人的本质能力中，最核心、最独特的那个根源性能力——即意识这一特殊的劳动力。在生产力的高阶形态中，意识的不可还原的创造性，成为整个生产过程的“第一推动力”；而纵观整个人类历史，正是劳动（包括体力劳动和意识劳动）的持续展开，才孕育了一切灿烂文明。

所以，我无意将人类文明“扁平化”为一笔冷冰冰的经济账。恰恰相反，我尝试将人类文明“立体化”到一个更宏大的存在论高度：我们不是在否定文化的绚烂，而是在追问绚烂从何而来。

真正的扁平化，是将人简化为一个文化符号的载体；而我的努力，是将人重新确立为那个能够创造、延续并超越一切符号的、拥有以意识为核心的最高级劳动力的活生生的主体。这不是对人的简化，而是对人的最深层的确认与解放。